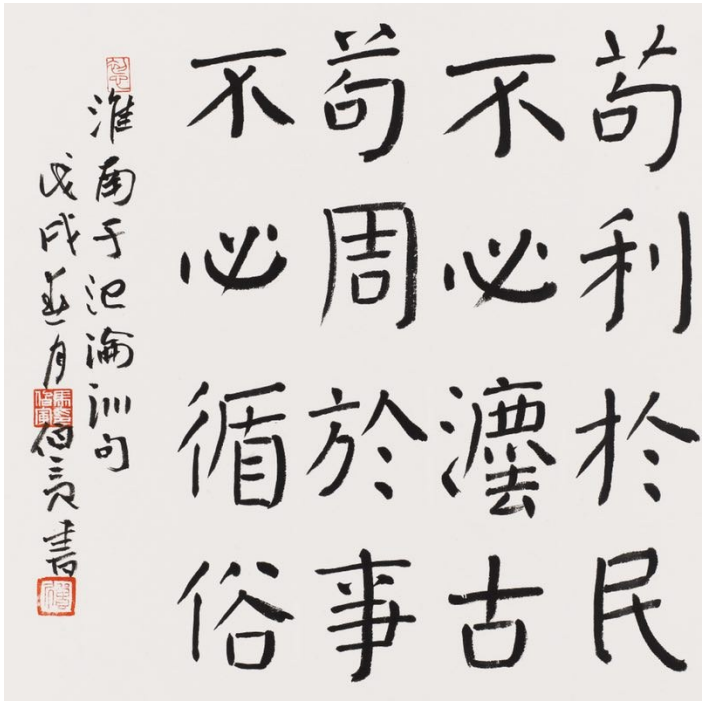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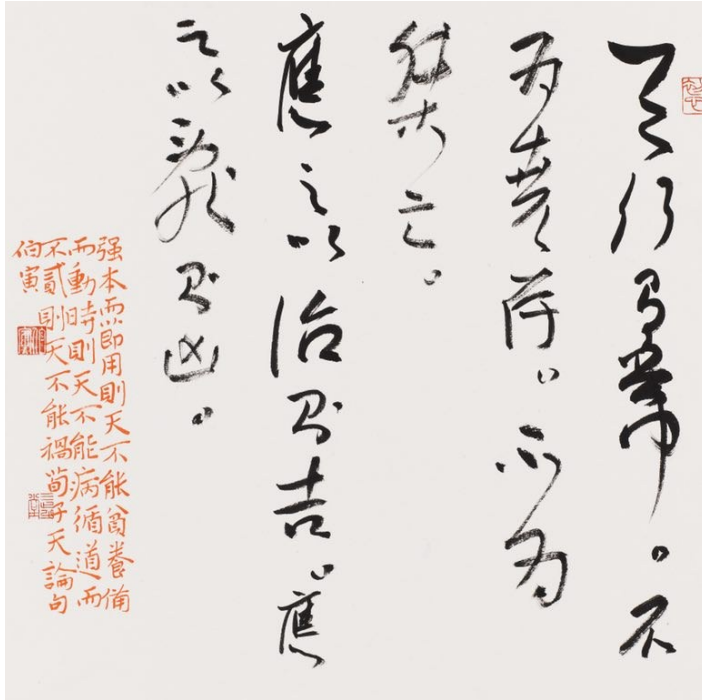
书写新时代——名家书写习近平经典用语

编者按:

纵观习近平总书记历次重要讲话,不难发现他曾数次引经据典阐述思想,或用诗文俗语释疑解惑,或用打比方、讲故事的方式阐述道理,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渗透其中,提纲挈领、纵横捭阖,展现出独特的语言风格和人格魅力,平实中蕴含着大智慧。《中国书法报》自创刊以来,始终以“传承中华文明,弘扬时代精神”为使命,立足服务于人民群众,并积极响应、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的精神实质,充分发挥传播导向的主观能动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为了让广大读者朋友通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领略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内涵和思想,我们特别策划“书写新时代——名家书写习近平经典用语”栏目,让大家在欣赏书法作品的同时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



马伯寅 楷书 “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俗”



马伯寅 草书 “天行有常，应之以治则吉”

苟利于民，不必法古；
苟周于事，不必循俗。

讲话情景：

2018年4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讲话原文：

当今世界，变革创新的潮流滚滚向前。中国的先人们早在2500多年前就认识到：“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俗”。变革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谁排斥变革，谁拒绝创新，谁就会落后于时代，谁就会被历史淘汰。

从顺应历史潮流、增进人类福祉出发，我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并同有关各方多次深入交换意见。我高兴地看到，这一倡议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欢迎和认同，并被写进了联合国重要文件。我希望，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携手前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创和平、安宁、繁荣、开放、美丽的亚洲和世界。

出处：

刘安《淮南子·汜论训》

原典：

故圣人制礼乐，而不制于礼乐。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教有经，而令行为上。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

释义：

“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俗。”“苟”：如果，假如。“法”：效法。意思是说先王的制度，如果有不适宜的就要废除它；后世的事，如果有办法好的要定下来发扬它。

这句话出自汉朝刘安的《淮南子》，是其《汜论训》里面的一句话。当然，原文是说“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意思是一样的。就是说只要对人民有好处，就不必一定要效法古人的制度；只要有助于事情的成功，就不必沿袭旧有的规矩。是说不断改革、不断创新本来就是历史的常态。只要坚持有利于人民、有利于事业的原则，改革就应该推进，也只有推进改革，才能够达到所谓有利于民、有利于事业的这样一个目的。这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说的，如果拒绝改革、拒绝创新，就只会被历史淘汰。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

讲话情景：

2018年4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讲话原文：

“天行有常，应之以治则吉。”中国进行改革开放，顺应了中国人民要发展、要创新、要美好生活的历史要求，契合了世界各国人民要发展、要合作、要和平生活的时代潮流。中国改革开放必然成功，也一定能够成功！

出处：《荀子·天论》

原典：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脩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渴，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

释义：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的意思是自然的运行是有规律的，它无所偏袒。顺应这个规律就吉祥，违背它就有灾凶。所以智者、圣人只考虑世间之事，只考虑如何顺应自然，而不去考虑怎样改变自然规律。

荀子把运动变化等机能叫作“神”，把运动变化所形成的自然界叫作“天”。荀子认为“天”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其运行规律也是客观的。荀子认为：“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荀子·天论》）“常道”，“常数”都是指自然界所固有的法则、规律。

大自然的运行有其自身规律，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如此，只有看清形势制定顺应时代潮流的政策满足人民要发展、要创新、要美好生活的历史要求、才能天下和乐、国泰民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进行改革开放，顺应了中国人民要发展、要创新、要美好生活的历史要求，契合了世界各国人民要发展、要合作、要和平生活的时代潮流。中国改革开放必然成功，也一定能够成功！



马伯寅

1974年3月生，河北保定人，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国际金融法方向），现任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挂职）。18岁加入中国书法家协会。曾任中国青少年书法协会分会副主席，北京大学书画社社长，中国保险业书画艺术研究会副会长。荣宝斋签约书法家。

曾入选全国第五届书法篆刻作品展、第七届全国中青年书法篆刻家作品展、首届中国书坛新人作品展等中国书协举办的重大展览。曾获第二届全国电视书法大赛、全国首届“赛克勒杯”中国书法竞赛、全国首届“兰亭杯”书法大赛、上海江南杯全国书法大赛、迎香港回归全国大学生书画大赛等国家级书法比赛一等奖共十余次。

出版《马伯寅书法选》。作品发表于《中国书法》、《书法导报》、《书法博览》等多家专业报刊，艺术简历被收入《世界华人书画家大辞典》等辞书。作品在美、日、英、法、新加坡等国，台湾地区及全国20余个省市自治区展出，被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中国遵义纪念馆等多家艺术单位收藏。

谈马伯寅书法

□ 胡抗美

新时期书法发展的突出特点是，中国书法已经独立为一个艺术门类。

汉字和书体发展历史也是一部特殊意识形态的历史。不管甲骨文字还是金文大篆，内容几乎都是占卜祈祷、歌功颂德，文字的使用与书写掌握在少数上层阶级手里。秦统一六国后，首先进行了“书同文”的改革，小篆成为官方书体。可见汉字的使用承载着大一统的任务与作用。而在以后的书法发展历史上那些熠熠闪光的书法家，如锺繇、王羲之、褚遂良、颜真卿、苏轼，直到康有为、于右任……大多都是家族显赫，官居朝堂。他们的传世作品无论丰碑大碣，还是书稿信札，均可谓极尽能事，不让风雅。中国书法的传统也以此为主脉延续至今。

古代中国书法是文人士大夫必备之素质，也是文人士大夫阶层生活中的风雅趣味。由于文人士大夫的特殊身份，他们的素质及他们的风雅趣味对社会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力，从而使书法这颗美的种子，能够在更加广泛的范围里生根、开花、结果，浸润到每位炎黄子孙的心灵深处，以至于成为中国美学的基础。

然而，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在新旧文化、中西文化的碰撞中，书法艺术的传承出现了断层。同时书写工具的改变，信息时代的到来，书法早已不再是科举制中人才选拔的敲门砖，历史上书法艺术主脉的传承者群体性消失。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书法发展才拉开了新的序幕，各类书法活动风生水起，由学人领军与全民互动形成了中国书法的新局面。但是，书法要真正体现出传统审美的高度需要几代人的长期努力，尤其是以书法审美为核心的美育教育的艰巨性，是书法事业健康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

虽然现今如今的领导干部不再被冠以士大夫的称谓，但仍然是社会群体中的精英

群体，他们的文化素养和责任担当对整个社会的引领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而书法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形式，自然应该成为优秀领导干部必备的文化素养。而现实情况是，大多数领导干部都喜爱书法，但真正懂书法的人很少，能以高水准进行专业性创作的则少之又少。再加上社会不良风气的存在，一些不懂书法的领导干部妄加评点书法的现象，直接导致了社会上对书法认知的观念混乱。

令人欣喜的是，近些年来随着社会风气的转变，在领导干部中又出现了一批有见地有创作能力的书法家和尊重传统、敬畏传统的书法爱好者，马伯寅算得上其中的出类拔萃者。

伯寅从11岁开始，跟随外祖父研习书法，日临千字，寒暑不辍。

1988年，14岁的他便以小楷作品获得首届全国兰亭杯青少年书法大赛一等奖。其后三四年间，伯寅几乎成了获奖专业户，获得了全国书法大赛的十几个一等奖。伯寅以此作为更高的起点，开始涉猎楷书外的其他书体，1991年其草书作品入选首届中国书坛新人作品展。1992年，不满18岁的他人选全国第五届书法篆刻作品展并被批准加入中国书法家协会，这应该是中国书法历史上最年轻的会员。伯寅在书法领域少年成名，我觉得是他审美上天生敏锐的感受力和个性上的不甘平庸使然，同时也得益于他作为学霸的优势。同年，他被北京大学法学院录取，开启了人生中另一个方向。

读书期间，法学领域的理性思维和学术训练，中国金融市场的演进与变迁，启迪了他另一方面的智慧，十余年时间伯寅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学业上，直至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国际金融法方向）。可贵的是，他在北大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艺术梦想，他用汉隶、魏晋传统陪伴着自己来完成学

业，其间作品入选第七届全国中青年书法篆刻作品展。大学本科时担任了北大学生书画社社长，在留校任北大团委负责人期间，全国大学生书画比赛、北大百年校庆书画邀请展等活动都在他的精心策划下得以成功举办。

从伯寅近作可以看出，其审美取向偏向于古拙、沉厚、雄健。虽然起初是以小楷打下坚实基础，但他对于字形的欹侧变化更为着迷，我认为这源自天性中的审美趣味，也与他的人际相关。他在波澜壮阔的金融机构弄潮，作为援疆干部到过天山大漠，作为地方监管领导徜徉于东海之滨，广博览，多见闻，虽然看似和书法并无关联，但多元文化的见识与融会，反而从不同角度给他的书法研习打开了一扇窗，提供了更广阔而新颖的观照方式。他曾送我一本自己的金融法专业著作，这种专业性研究思维和艺术家的感性思维在他身上似乎取得了一种平衡。其实艺术家所做的大量实践试验都是在找寻一种平衡关系，也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度”，是否能够找到自己的度并把握好这种度，决定着艺术成就的大小。艺术如此，工作、生活亦如此。

艺术工作和机关工作大不一样，机关工作需要沉稳冷静，艺术工作则需彰显个性。伯寅文质彬彬，言行慎重有节，但从他书法作品中却能看到他不拘一格的强烈个性。他虽然有着深厚的传统功底，但却不甘囿于古人窠臼，对于创新求变有着强烈的企图心。继承与创新是当代书法发展的两大课题，伯寅在这两个方面都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与实践。

伯寅一直说书法是他的业余爱好，即便如此，他在实践中进行的仍是专业性研究的探索，这源于他对书法专业性理解与认识。我曾经说过，当今书坛很多人动笔不动脑，忽视和轻视对书法审美的思考，这正是欲向前一分一毫都非常不容易

的重要原因之一。书法已经独立为一个艺术门类，按照书法规律思考书法的发展问题，事关书法艺术的前途命运。伯寅虽不是职业书法家，却对书法的发展承担着一份担当，对书法的未来方向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在书法研习创作中能够重视艺术表现和尝试。

伯寅的书法注重传统、注重基本功训练，其作品体现出对中国古代书法经典法帖的汲取与承继。作品面目丰富，有的古拙厚重，有的雄强恣肆，有的文静秀气，有的洒脱流利。他的小楷除了晋、明两代经典的精髓之外，又融入了隶书与墓志的结构与笔法，格调高古朴拙，结体灵动变化。他的行草书在北碑雄强的基调中融入了帖学经典元素，有的作品碑多一些，有的作品帖多一些。他能够尝试打通碑帖藩篱，体现出强烈的突破意识和表现意识。

我们都和伯寅一样，在生活与工作中寻求平衡，从理性与感性中寻求平衡，从传统与创新中寻求平衡，在内容与形式上寻求平衡……而平衡并不是平均分配，而是“和而不同”，要想取得平衡，必须打破均衡，必须想明白最急切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最本质的节点在哪里，甚至需要刻意突破舒适区，去尝试越界、过度，找到自己的独特点。在书法艺术方面，应当坚持传统植根传统，研究和遵循汉字与艺术符号（或元素）的审美规律，情感与形式的规律，组合方式规律，对比方式规律，形象思维规律，还有继承、借鉴与创新规律，等等，这是书法家向艺术性深入的一条捷径。希望伯寅在今后的艺术道路上，发扬光大传统，去除他人的影子，更好的把握平衡的破与立，在现在的起点上有破有立，大胆突破，建立新的平衡，找到更高层面的自我。正如孙过庭所说：“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

国学常识

目录学原本是校雠学的一部分，以后才独立起来。章实斋《校雠通义》认为目录不过是校雠的结果，没有独立成为一科的价值，但图书编目，包含书籍分类标准问题，不是深通学术源流及修学程序的，便不能适当地解决以便科学者的参考，这类具有指导意义的目录编制，自应成为一种专科。

我国目录学的创始人是刘歆。刘歆将群书分成六类，每类作一说明，然后将书目排列，称为一略，并于六略之外，另编提要一种，名叫《辑略》，总起来称为《七略》。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以刘氏《七略》为蓝本，也分成六类，每类作了一个说明，无异于一篇学术源流考。

这种于书名、卷数、著者的记载之外另加图书内容说明或提要的体例，成了后来历代编书目的模。清代编纂《四库全书》，即有书目提要二百卷，每部及每类有总说明，每书有提要。

《汉书·艺文志》对古籍作了系统的介绍，为研究国学者必须参考的书（因为国学精华全在周秦古籍里面，后世陈陈相因，很少新的创作）。现有顾实讲疏的单行本可读。如果要略略知道汉以后的书，可翻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各类的说明文字（另有《四库简明目录》，册数较少）。国学书太多，精彩的很少，我们没有博览群书的可能和必要，所以读目录提要，是最好的方法。

清末张之洞著《书目问答》，就他所认为重要的国学典籍，介绍了两千余种。胡适之、梁任公也曾各开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这都是给初学者用的。张氏所开的书太多，胡、梁两氏所开的书虽不多，但胡适偏于文学，梁氏偏于史书，亦不甚合适。近年来编这种书目的还有李笠、钱基博、丁福保诸氏以及浙江省立图书馆等。

（摘自曹伯韩著《国学常识》）

你了解目录之学吗